

论毛泽东从严治党的基本理路

高祎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坚持不懈的追求和优良传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科学而又严谨的从严治党思想。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蕴含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清晰的实践理路,这对于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从思想上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必须吸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入党。为此,必须在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加强“思想入党”,不断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早在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必须通过政治与经济的斗争来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925年,毛泽东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时再次强调,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把那些革命意志坚强、不怕死、敢于斗争、纪律性又强的同志逐步吸收到我们的党内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目前的任务。1943年,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中强调,加强党内思想改造的目的在于使党的成员真正

实现无产阶级化,具备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延安时期,毛泽东创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3篇著名文章,更是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集中阐明了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

二、加强从组织上从严治党

党员干部是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最宝贵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多次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1937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任人唯贤”是党的干部选拔路线,而且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他始终强调要把党员干部放在革命以及建设事业的大风大浪中去历练。在长期的管党治党的实践中,毛泽东坚决反对“极端式民主化”和“极端式个人专权”,巧妙地运用哲学中矛盾的观点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在人民内部,不可能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没有纪律;不可能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没有集中。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和自律的统一,就

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干部可能会腐化蜕变,党也可能会失去本质。

三、加强从作风上从严治党

党的作风是党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态度、风格和习惯,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及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始终强调作出正确的决策策略,必须注重实际,并且要深入调查,所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十分注重在革命实践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决地依靠广大人民。他反复告诫党员干部,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很多人要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都是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奋斗,不要以为当‘官’了,就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同李自成差不多了”。毛泽东始终把敢于接受批评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同时强调批评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该积极地引导其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毛泽东不仅严以律人,更严以律己,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持优良作风,为全党作风建设树立了榜样。

四、加强从制度上从严治党

毛泽东始终把严明党纪党规挺在前面,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之前,要求大家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朱毛会师后,毛泽东集合部队再次强调党的纪律性。1942年,毛泽东在全党整风运动时多次谈到纪律:“孙行者一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1947年,毛泽东倡议中国共产党内重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做出6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大力提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1949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随后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

(作者高祎为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延安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价值体系构建研究》、延安大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延安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多维逻辑研究》的成果之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学习的榜样及精神

臧爱斌

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先后倡导学习了徐特立精神、吴玉章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等。通过学习树立了道德楷模,使教育人格化,对广大党员干部起到了示范作用。

倡导学习“领导经济建设成绩昭著”的领导干部

1943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闭幕时隆重奖励了22位领导国民经济建设及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昭著而又刻苦公、在群众中有信仰之干部。毛泽东的题词分别为:王震“有创造精神”;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刘秉温“善于领导群众”;惠中权“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等。概括起来就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创造精神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切实朴素,不夸不骄,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领导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忠实地努力、争当模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这些既是22位领导干部所表现的优秀品格,也是党和毛泽东所

倡导的领导干部应具有的伟大精神,更是延安精神的最完美阐释。

倡导学习“新社会状元”的劳模

中国共产党深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在遇到任何艰难险阻时就坚定地选择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党上下以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若渴的诉求,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劳模学习。边区第一届劳模大会的报告中他要求,“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第二届劳模大会期间,他充分肯定了劳模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期望边区及整个解放区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全部经济工作”。党的七大得出更加深刻的结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倡导学习“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

张思德,普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1937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担任过中央警卫团警卫班长和毛泽东的警卫员。后因为革命需要,张思德开始了烧炭工作,1944年9月5日,他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为了悼念张思德,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七大正式把“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进党章。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倡导学习“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

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至1937年加入西班牙作为支持国际反法西斯志愿者投身西班牙内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解放区,1938年4月,经延安转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直至以身殉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

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倡导学习“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愚公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3次提到愚公移山精神。第一次是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讲到自卫与反击的时候,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先向大家复述了这则寓言故事。第二次是5月31日所讲的“结论”。在谈到大会团结精神时指出:“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山挖掉。”第三次是在6月11日的闭幕词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标题,把这则寓言故事正式写进闭幕词中。毛泽东的《愚公移山》,赋予了寓言故事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完成了愚公移山从寓言到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使愚公移山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

袁芳 高布权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并日臻成熟的时期。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酝酿,在延安时期亦更加成熟、完善。1942年至1945年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等著作,阐明了合作社的性质、组织形式、特征、地位等问题。这一时期的合作社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合作社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成果,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表现。延安时期的合作社道路,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当前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提供了资瓷。

党中央初到延安时,陕北地区仍停留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土地改革后,人民分得了土地,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口粮和生活资料的自给,但布匹、棉花、火柴、农具等日用品还是依赖交换。传统的生产交换

关系仍然存在,是合作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供给非常困难。毛泽东曾表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了缓解边区财政供给的困难,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边区群众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关于合作社的性质,毛泽东在1943年《组织起来》一文中有明确的认识: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毛泽东认为,合作化是小农经济通往现代农业的道路。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公营经济,也区别于农民出于生产自救而发起的“唐将班子”。延安时期的合作社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毛泽东将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集体经济称为“崭新的经济形式”。

关于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大体包括

4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延安南区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毛泽东倡导,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坚持民办公助”的方针是延安时期合作事业的突出特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合作社大多是以公家股金为基础,其余向群众摊派,这种包办代替的合作社增加了群众的负担。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的讲话中谈到,合作社的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合作社一改摊派命令的作风,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践行了“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延安南区合作社在主任刘建章的带领下,取消摊派入股,通过分红入股、公债入股、实物入股、运输入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动员人们加入合作社。同时,实行退股自由,受到了边区群众的欢迎。毛泽东曾两次视察南区合作社,把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合作社

式道路看作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延安时期的合作社,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员资格、入股方式,到合作形式、盈利分红,都遵循了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

毛泽东对合作社寄予极大的期望,他认为,“发展合作社是生产制度上的一个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通过组织起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建立了从生产、交换,到分配、消费自给经济体系,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讲到的,根据地的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全面脱贫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机遇。在毛泽东同志逝世48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既是对伟大领袖的怀念,也为新时期发展合作经济事业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战略家,他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杰出贡献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实践两个方面。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如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旧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对把旧中国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中国的分析等。这些都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革命道路理论的创新

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之后,认为中国的主体在农村,重心也应在农村。在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城市中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深厚的革命基础,而城市则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他主张从农村出发,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武装割据,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分析的一次重大创新,为中国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新的正确的前进方向。正是因为有了“农村包围城市”正确的革命道路理论,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2. 社会变迁理论的创新

毛泽东对社会变迁理论的创新,体现了对社会变迁理论的中国化和应用化。他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变迁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还必须要有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变革。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过程,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同步推进,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社会变迁理论创新的具体应用。可见,社会变迁是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全面性的变迁,绝不是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变迁。

3. 社会调查方法论的创新

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方法论,具有非常鲜明的创新性。他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突出了调查研究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同时,他提出调查研究要摸清底细、搞清原因、制定对策,这种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的调查方法,不仅提高了调查的效率,也确保了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毛泽东还特别注重调查方法的多样化,如开调查会、深入基层等,他还认为,典型调查和普遍调查是社会调查最基本的方式。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1927年,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再到《寻乌调查》,调查研究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的核心。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体制机制正式建立,中央调查研究局的成立,推动了全党范围内调查研究风气的兴起。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贡献的启示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杰出贡献不仅体现在他对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创新运用上,更在于他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这个启示对当下的中国来讲,亟需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 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炼总结工作

现代化理论是社会学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二战结束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摆在刚实现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面前。在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面前,相继产生了“狭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三个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现代化理论。然而,现代化不仅有共性,更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那些盲目照搬现代化理论的国家,都陷入了“发展陷阱”之中难以自拔。中国依靠自己实现了发展,跳出了所谓“发展陷阱”,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毫无疑问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后,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越来越多,也产出了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但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容的精炼表达依然需要继续加强。“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西方式现代化的“窠臼”,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单一道路、单一模式的固定思维。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炼总结应同步进行,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成为继“狭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之后最重要的现代化理论。

2. 乡村振兴需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口流失问题。人口的大量流失,使乡村丧失了发展的主体和活力。因此,要振兴乡村,就要研究为什么乡村留不住人。答案从哪来呢?自然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实实在在的事,需要眼睛向下、腿脚落地、裤腿沾泥的实际行动。调查研究,需要正确的思想,需要正确的方法,需要正确的行动,需要正确的对象。调查工作不是一时之兴,而是一个常规工作。要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首先得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查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工作,需要认真对待,尤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做和研究。乡村振兴的调查,需要认真开展,扎实开展,切忌走马观花,问一不問二。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到乡村的真实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科学合理、落地生根的有效对策,才能真正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才能使乡村振兴起来。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及启示

高志奇